

全方位推動南向投資，此其時矣

●顏建發／健行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教授

2015年9月，蔡英文在選前推動的外交政策主軸定名為「區域實踐與國際參與」。優先重視的工作，是希望透過推動人道援助、災害救援、疾病防治、減緩氣候變遷等實質計畫，促進亞太區域的國際合作。關於新南向政策，蔡英文表示要引導台灣企業增加在東南亞與印度投資，著眼未來，將朝多元、多面向夥伴關係；在台灣希望推動貿易多元化的同時，「強化對東協和印度的整體關係，是我們理所當然的選擇」。蔡英文也說，「在我們務實拓展國際關係的作為中，政府與國內外非政府組織所締結的長期夥伴關係，將扮演核心的角色，並建置一個非政府組織的國際中心，讓台灣成為亞太地區支援非政府組織的領航者，支持這些團體進行有價值的工作。」不過，毫無疑問地，台商南向投資仍是主要的議題。

東南亞一直以來都是台灣對外投資的主要地區，但自鄧小平南巡，中國啟動第二波的改革開放後，東南亞的台商逐漸轉向中國投資。然其後，隨著美國2009年的重返亞洲以及2012年再平衡戰略的出爐，美國更加碼投入東南亞，日本也逐漸加重對東南亞的投資，而印度的重要性也提高了。根據湯森路透公司（Thomson Reuters）指出，2014年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越南的「外商直接投資」（簡稱FDI）總合為1,280億美元，多於流入中國的1,196億美元。2014年東南亞主要經濟體吸引的FDI總合，多過於中國吸引的FDI，這是連續第二年東南亞FDI超越中國。其中，菲律賓的FDI成長最快，高達66%；而東南亞最大經濟體印尼，雖然歷經總統大選，FDI成長仍達到10%。至於泰國則因為政變造成政局動盪的原因，外商投資下滑。緬甸進入民主化階段，將加快改革開放，今年目標GDP達9.3%。至於印度，根據BMI（Business Monitor International）的最新研究顯示，2016、2017年的經濟成長率有望達到7.2%。

壹、中國在東南亞與印度的投資

中國在海外投資比例，對東南亞排名第三，僅次於香港與北美。其中，對東南亞投資不斷增強。1999年上半年亞洲金融危機逐漸解除後，東南亞國家由於貨幣貶值，當地的資產價格有所下降，而為恢復元氣紛紛放開外資管制，出售不動產和金融業及國內企

業，同時放鬆對周邊國家進入本國市場的限制。這些都為中國企業進軍東南亞市場提供了大好機會。中國-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以下簡稱ASEAN或東協）自由貿易協定簽署後，雙方貿易大幅提升，雙方同時在外交、經濟、交通、海關四個部長合作機制基礎上，在金融、農業、交通、資訊通信、公共衛生、人力資源、教育、旅遊、文化、科技、民間交往等領域進一步深化合作。

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簡稱CAFTA）建成後，將形成一個擁有十九億消費者、近六兆美元國內生產總值。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將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貿易區，也將是發展中國家組成的最大的自由貿易區。2009年8月15日，《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投資協議》簽署，標誌主要談判結束。2010年1月1日，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正式建立。1月7日，在廣西南寧舉行的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建成慶祝儀式上，中國-東協針對十八個合作項目正式簽約，簽約金額共48.96億美元。數據顯示，中國對東協的投資近年來發展迅速，2010年以來，對東協新增的投資占中國對外投資總量60%以上。2013年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正式提出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升級版，主要是為加強經貿投資合作、改善總體的市場准入條件及雙邊貿易平衡，目標到2020年雙邊貿易總額達一兆美元。2013年9~10月間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其中，東協與印度屬「一路」的範疇。數據統計，2014年中國、東協雙邊貿易額為4,801億美元，年增8.23%；2015年上半年，雙邊貿易額為2,243.8億美元，年增1.6%。整體而言，東協國家約占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12%。而中國對印度的直接投資（不包括再投資）在2015年猛增至8.7億美元左右，是2014年的六倍以上。

基本上，東協十國的經濟水準與天然稟賦並不相同，而各國不同的產業特性正好對應於中國自身已趨向產業多元化。東南亞國家各有不同的產業發展重點：新加坡將發展知識密集型產業，提出要成為全球知識驅動型產業的中心之一。馬來西亞在電子機械、積體電路及部件等技術性勞動密集型產業方面優勢較大，有向資本技術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產業升級的一定基礎。泰國產業發展水平居於馬來西亞之後，仍將主要致力於發揮其在農產品、木材傢俱製品、皮革、電機、成衣等方面的優勢，同時謀求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升級，而印尼、菲律賓和其他印支國家仍將主要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從中長期看，中國的龐大市場將吸收更多的東南亞國家的出口，而東南亞也將成為中國企業向外投資的首選地區之一。至於印度，世界銀行預料2016年國內生產總額（GDP）增長7.4%，增速將超過中國。

至於對印度的投資。印度經濟增長十分依賴服務業。印度的中產階層和年輕消費者迅速增長，內需市場潛力十足。2015年，印度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額較2014年上升16.5%。而中印兩國間的邊界摩擦雖未消除，中國企業的進駐印度的趨勢並未改變。印度經貿高層表示，一般總體，中國做決定比日本快，故雖然日本對印度的直接投資當前大幅超過中國，不過今後勢將面臨與中國企業的激烈競爭。

貳、日本在東南亞與印度的投資

東南亞早在1960年就是日本的製造基地，而1990年他們將注意力轉往中國，中國也藉此機會吸收了大量日本投資，但東南亞六億人口和不斷增長的中產階級顯然對日本的供應商很有吸引力。但由於中國的反日情結抵制和工資成本的增加，促使日本加強與東南亞國家合作。尤其是，釣魚島之爭後中國表現出的反日情緒，日方對此心有餘悸。根據政府機構日本貿易振興會（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的統計數據顯示，2013年日本在中國的投資暴跌了31%，降為49.3億美元。日本在2013年於東南亞的投資比去年同期則增加了55%，達102.9億美元。

而且在美國重回亞洲戰略驅使，並鼓勵亞太地區達成貿易協議的大環境下，日本政府也非常看好與東南亞地區的合作。日本首相安倍（Shinzo Abe）就曾表示，「東協將在日本的經濟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日本政府也鼓勵日本公司向東南亞擴張，例如日本當局提供了數十億美元的發展資金，協助日本公司投資在越南、緬甸的工業園區、在柬埔寨的鐵路建設和在老撾的飛機場等項目；此外，日本政府方面還幫助日本企業在緬甸、越南和印尼尋找當地的合作夥伴。相較於過去集中在電子產業，日本現在投資東南亞變得更加多元化。而前些年，印度的新創企業一直都在吸引西方投資者的青睞，然而2014年，隨著日本軟銀的創始人兼CEO孫正義正式宣布向印度市場投入100億美元來進行印度的「訊息革命」，印度市場正式開始轉入由日本投資者主宰的市場。

參、台商逃離中國的驅力

根據2014年3月底中華徵信所新出爐的台灣地區中型集團企業研究（資產總額及營收總額同時達20億元到50億元之間，或資產總額雖達50億元以上）調查顯示，2012年，二百五十個中型集團有二百零四個集團投資中國，比例接近八成二（81.6%）。研究指出，2012年台商中型集團虧損家數達到三百零九家，占整體比重46.47%，而虧損達5,000萬元以上的企業家數，高達一百九十八家之多，占整體虧損家數比重的64.08%。由上述數據獲致的結論是：中型集團在中國「多數獲利者賺的是小錢，多數的虧損者虧的卻是大錢」。

中國東莞地區約八百家台商，其中有20%在進行升級，包括產品升級、技術升級、設備升級與自動化；另有30%的台商正在進行轉型，轉為服務業、房地產、製程環保（節能減排）等等類型的台商；而有50%的台商在觀望，其中不少人因為面臨嚴重的生存困境，因而無心戀棧，興起了不如歸去的念頭，最後將土地賣掉或將廠房出租，漸漸地結束營業。工人嚴重短缺、工資上升、原材料價格大幅度上漲以及賦稅減免終止、銀行緊縮銀根而現金流左支右絀、缺電引發出貨不穩等等不利因素，使得台商企業的利潤空間急劇縮小。而由於台灣多數是中小企業，其承受力沒有歐美等大企業那般，只能經營慘澹。不只珠三角的情況嚴重。整個江浙一帶，目前八成企業有兩成以上的勞動力缺

口。長江三角一帶原來以生產成本低、固定成本低的製造業見長，如今已逐漸喪失。中國薪資上漲，對勞力密集的製造業台商影響最大。台商對中國投資信心出現下滑。

面臨中國經濟結構調整，以及中國企業崛起的競爭擠壓。這一類的台灣中小企業和傳統產業已岌岌可危。2014年4月中旬，東莞市裕元鞋廠爆發台商赴中國投資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罷工潮。探索箇中理由，對於該代工廠而言，薪資成本急速上漲固然是致命傷，但中國追繳積欠的社保基金卻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因於過去未提足「五險一金」（即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住房公積金），面臨被追繳積欠十五年的社保金，初估將高達10億人民幣，相當台幣50億元。

顯見，兩岸產業的競合關係已經在改變，包括因市場競爭而降低的互信，及中國服貿市場准入充滿障礙、潛規則等問題。兩岸相關產業合作正面臨嚴厲的挑戰。尤其是在中國「國進民退」的形勢下，中小台商想要轉型進入中國市場的障礙，遠比中資中小企業更為艱困。台商在中國出現「退場潮」，反映出不適合中國投資環境變化的台商需要離開的現實，這是中國產業發展的必然趨勢。有些台商已將工廠移到東協國家，包括越南、印尼、柬埔寨等等國家。過去十幾年台商在中國投資最大的轉變是：「以前是中國唯一，現在是中國加一」。

今（2016）年1月20日經濟部投審公布，台商對外投資去年大幅成長，更是史上首度超過百億美元大關，合計達107.45億美元，年增率高達47.3%。然而，對中國投資，因為中國的環境逐漸惡化，台商對大陸投資件數已連三年負成長，幅度擴大至去年-17.2%。因此，投審會認為，台商對外投資大增，是因為東南亞市場將會擴大。

肆、南向投資此其時矣

不管如何，海外台商既是台灣經濟持續發展之所賴，政府責無旁貸需思考如何在策略上與政策予以協助，同時，戰略與政策面當不僅止於經濟層面，此乃關乎全方位的配合。而當前的現實是，不管貿易或投資，台灣經濟出現高度依賴中國的現象。中國經營環境的變遷將會嚴重衝擊台灣的經營環境。面對中國投資環境的急遽變化，以及台商經營上的嚴峻挑戰，台灣政府如何幫助為數眾多在中國生存困難的台商，是需要思考的重要政策作為。首先，台灣政府如何協助台商保持在中國的優勢，這是保本必須思考的事。其次，台灣內部經濟低迷，卻任台商的資源飄零於外，如何將台商視為資源，轉為利用，或協助其升級或轉進，也值得思考的課題。再其次，往東南亞或其他開發中國家移轉台商的投資，是重要舉措，但台灣的政府有全面的政策規劃與準備了嗎？也值得質問與探索。無論如何，中國台商的虧損果真如此嚴重，卻又無法尋得出路，勢將影響下一波台灣經濟的成長與安定？同時，一旦台商無法脫困，而成為中國政府救濟的下一波，那麼，台商勢將更依賴中國政府，屆時是否會對台灣政府的治理產生挑戰，也值得未雨綢繆。

對於台灣來說，由於受限於中國的孤立與打壓，為了分散台灣資本對中國的過度集中，南向東協與印度挺進將可以給台灣在出路上提供更多的選擇。更何況，東協與印度擁有多元文化，是台商進軍南亞、中東的一個良好的媒介與跳板。而南向政策在李前總統與陳前總統任內，固然是施政重點，但遭到中國的磁吸效應的衝擊，效果並不顯著，待馬英九上台後，向中國傾斜又更嚴重。現在南向的風潮，可以說千載難逢的機會。尤其在中國積極推動資本南移，日美也格外重視，再加上東協與印度自身的積極開放政策不斷出爐，投資的動力看來已十足具備。台灣宜趁這個勢，強化台灣與東南亞與印度的雙向交流與社會經濟整合。

帆已上桅，風也飽滿，啟航南向，此其時矣。◆